

#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之起源及流布

艾仁贵

**内容提要** 脱胎于同名传奇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并非由来已久。该形象源自晚近的13世纪,一开始在基督教圈中并无多少影响。但在宗教改革后,该形象突然得到迅猛传播并借助于印刷品越发流行,成为欧洲妇孺尽知的人格化形象,且作为犹太人被诅咒性的身份隐喻而代表着他们永恒的散居生存状态。随19世纪末种族卫生及精神病理话语的渗入,该形象又被认为是犹太人身体病态的具体表征。该形象被以讹传讹,流毒甚剧,从而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连一些主张复国的犹太人也接受了这一形象,但却对之作民族化的阐释。对该形象的制作、规训、传衍、推广,充分凸显出他者想象下的权力运作、话语控制及文化博弈。

**关键词**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反犹 亚哈随鲁 犹太“病” 锡安主义

在漫长的中世纪,形成了诸多长期流传且根深蒂固的反犹形象,它们共同筑就了反犹行为潜在滋生又不时喷发的温床。其中,“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下文简称“该形象”)即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它有着极其丰富的神学、社会与文化内涵,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由此演绎而出的故事、诗歌、小说、戏剧、谚语、漫画创作层出不穷、数不胜数。著名思想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曾将之视为欧洲文化的三大主要神话之一。在反犹动员的不断塑造与宣传下,它逐渐发展为欧洲大众观念中的人格化犹太形象,甚至还被作为丑化对象的犹太人自身所利用。或许正是由于该形象被再三演绎运用,其起源及流布的真况实貌往往不为人们所知。本文在观念—社会互动的视阈下对此形象的建构史进行个案分析,藉此探知大众形象所折射的社会动向与文化内涵,以期推进对于反犹观念及犹太形象史的研究。

## 一、“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的文本来源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传奇的基本内容为:当耶稣背负十字架前往殉道的途中,路过一个犹太人的家门口正准备歇息一下再走时,这个犹太人敲打耶稣后背并吆喝他快走;耶稣随即回答道“我走,不过你必须等到我再次回来。”以此传奇为基础,“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流布开来;它在后世的传播中形成了诸多版本,但大致都包括“击打基督”、“永世受罚”、“被罚流浪”、“等待复临”、“充当见证”等要素,它们之间相互支撑、联系紧密,共同构成该形象的根本支撑点,并为其提供着神学上的合法性。该传奇具有强烈的基督教护教色彩,有着《旧约》、《新约》、教父等多重神学来源;而其中主要是在“基督受难”的框架中形成,《新约·福音书》为其最根本的来源。尽管有着诸多经典来源的支撑,但这一形象并不见于《旧约》、《新约》,也不见于早期教父的著作;可以肯定,该形象是在先前诸多古老传说的基础上糅合而成,它主要流行于十字军东征后期的东地中海地区,尤其是亚美尼亚一带。<sup>①</sup> 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象,它的真正

<sup>①</sup> G. K. Anderson, “Popular Survivals of the Wandering Jew in England,” *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vol. 46, no. 4 Oct., 1947, p. 367.

形成实际上相当晚近,大约是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其最初出现的地点可能是意大利。对此形象的最早记载见于1223年博洛尼亚的拉丁编年史;其中并未交代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及其身份,但“击打耶稣”、“被罚流浪”、“永世受罚”等要素都已具备,并加入了对“基督复临”的期待,因而“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在此被初步建构起来:

在同一年,弗里德里希二世拜访了教皇洪诺留三世,并与耶路撒冷的约翰王、塔兰托大主教和其他贵族相会在费拉拉修道院;那里来了一些从山脉另一边来的朝圣者,他们告诉修道院院长与修士,他们在亚美尼亚看见一位犹太人,基督受难时他曾在此。当基督前往殉道的途中,他以这些话邪恶地催赶基督:“快走,快走,你这个魔鬼与引诱者,快去领受你当得的。”基督这样回答他:“我走,可你要一直等到我回来。”据说这个犹太人每一百年都重新回到30岁,直到基督回来他不能死去。<sup>①</sup>

5年后,更为详细的叙述由英国修士罗杰·温道夫所提供。他在《历史之花》(1236年成书)中记载了一位亚美尼亚大主教在访问圣奥尔本斯修道院时,自称不久前曾与那位不朽者共餐过,而后者正是在耶稣背负十字架前往刑场途中敲打其后背并吆喝他快走的犹太人。与博洛尼亚版本一样,都以亚美尼亚为场景;但讲述者由朝圣者转为大主教,讲述地点由费拉拉修道院变成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并且添加了“见证基督”的内容。尤为关键的是,它清楚地交代了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及其职业——彼拉多的门卫卡塔皮鲁斯,并提及他皈依基督教改称约瑟夫并过着修士的生活;至此,该形象已完全建构成形。罗杰·温道夫的《历史之花》这样记载:

犹太人约瑟夫仍在等待基督的再次来临 (D. 1228A.)

在这一年,一位亚美尼亚大主教来到英格兰朝圣以瞻仰圣徒的遗迹,并访问了这个王国的圣地,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他带着教皇写给信徒与教士们的推荐信,据此他们给予他应有的尊敬与荣耀。他到来后前往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在那里他受到院长及修士们的充分尊重;由于旅途劳顿,他在这里停留了一些日子以便使自己及随从得到休息,通过翻译他与修道院居住者进行了交谈,其中他就这个国家的宗教与宗教遵守进行了许多探讨,并提及东部国家的许多奇异事情。在谈话过程中,他被问及是否看到或听见有关约瑟夫的一切,一个在世界上引起许多谈论的人,我们的主受难时他曾在此并对其进行讲过话,他仍然活着以作为基督信仰之见证,作为主教随从及翻译的骑士以法语回答道,“我的主人完全知晓那个人,这个已经提到的约瑟夫在他前往西部国家前不久曾于亚美尼亚大主教我主人的桌前吃饭,故而经常被看到并与他有过交谈。”那时他被问及从基督到约瑟夫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此回答道:耶稣基督在受难之时被犹太人抓住并带往审判大厅,在总督彼拉多的面前基督因犹太人的指控可能被审判,但彼拉多却找不到判他死刑的理由,就对他们说“将他带走,按你们的法律来审判。”然而,犹太人不断叫嚷,在他们的要求下彼拉多释放了巴拉巴而将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随后,犹太人拉拽着耶稣前行到达了大门,一个为彼拉多服务的门卫(porter)卡塔皮鲁斯(Cartaphilus)在耶稣即将跨出大门时,极为不敬地用手敲打着他的后背,并嘲笑道:“快走,快走;耶稣,你为何停下来?”耶稣严肃地回过头来看着他说:“我走,不过你必须等到我回来。”据我们的主说,这个卡塔皮鲁斯一直在等待他回来;在我们的主受难时,他年约30;每当达到100岁高龄后,总是返回到他在我们的主受难时的年纪。基督死后天主教信仰扎根,这个卡塔皮鲁斯由阿纳尼斯(Ananias,他由使徒保罗受洗)受洗皈依,并被称为约瑟夫。他通常居住在亚美尼亚与其他东

<sup>①</sup> 转引自 G. K. Anderson, *The Legend of the Wandering Jew*,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8.

部国家的交界处,在主教及教士中间打发时光;他是一个圣洁与敬虔之人,一个寡言少语且行为谨慎之人,除非被主教及虔诚之士问到否则一言不发;然后,他讲述了发生在过去的古老事件,包括我们的主受难与复活,以及见证耶稣复活的圣徒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他还讲述了使徒们的信条,以及他们的布道与区分;在谈到所有这些时,他脸上没有任何的笑容与轻谩,正如一个十分悲痛且敬畏上帝的人;他一直持有敬畏地期待着耶稣基督的到来,以防在最后的审判中为他在基督前往殉道的途中所施加的侮辱给予应得的报应。许多人从世界各地前来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如果他们不明白,他将向他们就被问及的内容解答一切疑难。他拒绝所有施舍给他的礼物,而只满足于最低程度的食物与衣服。由于对上帝无知而获罪的他寄希望于拯救,因为基督在受难时以这些言语为其敌人祈祷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sup>①</sup>

随后的不少编年史记事都将其纳入其中,英国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的《大编年史》(成书于1259年)将温道夫的记载予以全部吸收,<sup>②</sup>并在1252年的记事中增补了来自亚美尼亚的新见证,以表明该形象得到不断的强调与复现“他们(亚美尼亚人)还毫不怀疑地陈述了他们所知道的约瑟夫,他曾在基督即将被钉十字架时见过基督,就像习惯一样仍然活着的他一直在等待基督将要审判我们所有人的那一天的到来;这种情形是世界上最为奇妙的事件之一,也是对基督信仰的极大证明。”<sup>③</sup>帕里斯的编年史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从而使该形象开始向外传播。意大利占星家圭多·博纳蒂(Guido Bonatti)记载了一位名叫约翰内斯·布塔达斯的犹太流浪者于1267年出现在弗利(Forlì);一本14世纪的捷克手稿《马里厄与安瑟密就基督受难的简短对话》(*Dialogus beatae Mariae et Anselmi de passione Domini*)也对其加以记载。<sup>④</sup>至此,这个因击打基督而被罚永世流浪、直等基督复临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开始固定下来,并被一些作家收录其中;但这只是该形象建构的初期阶段,其影响仅限于少数不知名的编年记载,而且也没有与整个犹太民族联系起来。

## 二、人格化犹太形象的建构及内涵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在成型后一度从编年记载和公众视线中消失,但随着宗教改革对犹太人神学作用的重新关注而再度浮现,1586年帕里斯的《大编年史》由新教徒译成德文在苏黎世出版,直接促成了该形象在德国的开始。该形象由于契合了早期新教的神学主张而得到快速的传播:一方面,它提醒人们注意犹太人的“邪恶本质”,他们作为敌基督者迫害与谋杀了救世主;另一方面,基督通过使这个犹太悔恨者奇迹般的存活与流浪不仅体现了他的仁慈与伟大,而且让其成为基督真理的证明及基督将要复临的先兆。1602年是该形象建构史上极为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在德国出版了小册子《一个名叫亚哈随鲁的犹太人的简短描述及其故事》(*Kurtze Beschreibung und Erzählung von einem Juden mit Namen Ahasverus*,下文简称《亚哈随鲁故事》)。除这位犹太人外,故事的另一主角——保禄·冯·埃岑(Paulus von Eitzen, 1521-1598)则是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他曾师从路德学习神学,后来成为著名的新教神学家并担任了石勒苏益格的主教。尽管目前已无法确定谁是本小册子的作者,但据学者安德森的研究,其身份基本可以肯定为新教徒。限于篇幅,择其关键的部分转译如下:<sup>⑤</sup>

①③ J. A. Giles, (ed. and trans.), *Roger Wendover's Flores Historiarum*, vol. 2, London: Henry G. Bohn, 1849, pp. 512-514, 532. 黑体为引者所加。

② Matthew Paris and *Chronica Majora*, (eds.), *H. R. Luard*, vol. 3, London: Longman, 1872, pp. 161-163.

④ Salo Baron,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vol. 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77.

⑤ 该内容来自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1602年莱顿版本,转引自 G. K. Anderson, *The Legend of the Wandering Jew*,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pp. 45-46. 黑体为引者所加。

石勒苏益格主教保禄·冯·埃岑……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及其他牧师,当他还是青年在维腾堡求学时,曾于1542年的冬天前往汉堡探望他的父母。在随后礼拜日于教堂举行的布道期间,他看见一位身材高大、长发披肩的人,光脚站在靠近圣坛的地方。这个人布道如此专注以致人们发现,除了当耶稣基督之名被念及时他低头鞠躬、捶打胸膛、深深叹息外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在此极其寒冷的冬天,他除了穿着一条底部破烂的裤子、一件长至膝盖的大衣与一身直到脚跟的披风外没有其他的衣服。要不然,他看起来就像个大约50岁的人。由于他的高大、衣着、举止而引起了注意,他被问及自己是谁及其职业为何。据说……他的名字叫亚哈随鲁(Ahasuerus),是出生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的职业是名鞋匠(shoemaker)。基督受难时他曾到场,自那以后一直活着并旅行在许多国家,为证明这个真实性他讲述了许多有关基督被逮捕及被带到彼拉多与希律跟前并最终钉死的情况。他比福音书作者与历史学家们讲出更多的此类事情;而且他讲述了政府的许多变迁,特别是东部国家,这些都是它们在这许多个世纪发生的情况。然后,他极其详尽地叙述了使徒们的生平、受难及殉道。

当保禄·冯·埃岑听到这些内容时,便对之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试图找机会与这个人直接进行交谈。最后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个犹太人将所有这些情况详细地予以告知。他过去生活在基督时代的耶路撒冷。他曾经激怒了我主基督,认为后者是个异端与引诱民众者(因为他不知道),正如大祭司与文士们所做的那样。他一直在试图将这个引诱民众者(他是这么看待基督的)赶出这个世界。最后当他们抓住基督并由大祭司带到彼拉多面前时,他参与到大喊“钉死他”并要求释放巴拉巴的行列,推动了给予基督的死刑判决。判决宣告后这个犹太人匆忙赶回家以便能看到基督,因为我主基督必定经过那条路。他抱着小儿子站在自家门前,他们能够看见我主基督路过。然后,当我主基督背负十字架经过时,他在这个犹太人的门旁停靠了片刻。这个犹太人就十分生气,责骂并命令基督走开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随后基督严厉地看着他,并富有深意地说道:“我站着并得到安息,而你却得永世流浪!”

这个犹太人立即放下他的儿子,他不能再停留在这个房屋中。他必须服从并追随已经指示给他的命运。后来,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他无法返回并进入耶路撒冷城。他的妻子、儿子及亲人再也没有见过他。他立刻进入外国,一个接一个,直到今日。在游历了许多国家后,他回到家乡发现一切都已荒废、耶路撒冷也被摧毁,以至于他无法辨认。上帝以如此漫长的苦难生活来指引他的目的,除了他于审判日时在不信上帝者的巨大怀疑面前充当基督受难的活的见证以外否则都将无法解释。但他必须忍受自己的命运,直到打动上帝以将他从忧伤之谷领向永久和平……

该小册子还强调他每到一处都能说当地语言,而且还于1575和1599年分别在马德里与但泽被人看到。1602年出版的这个仅有四页篇幅的匿名德文小册子共有九个不同版本,分别出现在但泽、莱顿、包岑三个不同的城市。<sup>①</sup>与四个世纪前的《历史之花》相比,《亚哈随鲁故事》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及其职业:此前是彼拉多的门卫卡塔皮鲁斯(希腊文作:κάρτα φίλος,意为“钟爱的”);而现在则变成鞋匠亚哈随鲁(Ahasuerus,也作Ahasver)。为何会出现这种身份变化?实际上,亚哈随鲁既非犹太名字亦非基督徒名字,而是来自《以斯帖记》中纵容宰相哈曼灭绝犹太人的波斯王;此人在后世犹太传统中通常被视为傻子的典型,选择这个名字显然有贬低犹太人之用意。而且,他的鞋匠身份也体现了高度的选择性。在地中海东部一带的传说中流浪者的身份是名鞋匠,民俗学者指出中世纪的鞋匠行会通常由流浪的商人团体构成;故此,制造鞋子的鞋匠却必须光脚流浪构成一种讽刺性的社会现象。

<sup>①</sup> 转引自 G. K. Anderson, *The Legend of the Wandering Jew*,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42.

随后这本小册子被迅速传播到国外,它几乎被译成所有欧洲语言;这本小册子之于该形象的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正如安德森(G. K. Anderson)所说“它或许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传奇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这本小册子,它完全有可能与其他许多经外起源的传奇一样,流入浩瀚的沙海之中而仅为古物学家与传奇专家所知。”<sup>①</sup> 传说中的这个犹太人精通各种语言,每到一地必用当地语言讲述其传奇经历;而且他一直活着,每一百年又重新回到他在基督受难时的年龄。必须看到,这个犹太人的不朽并非是一种祝福,而是永远的诅咒:他就像个活死人(living corpse),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只是充当基督受难的目击者向当地人讲述基督的生平事迹并为其再度来临提供见证;吊诡的是,现实中的许多目击者又为他的真实存在提供见证,从而构成“见证之见证”。为证明其真实存在,不少欧洲人都声称曾亲眼见过这位犹太鞋匠。<sup>②</sup> 更有甚者,19世纪许多地方的博物馆(例如乌尔姆、伯尔尼)展示着据说是这个犹太人曾经穿过的巨大鞋子,而罔顾传说中他一直光脚的特征。很显然,大众观念中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并非是个缥缈不实、难以觅及的虚假人物,相反被建构为一个真实存在、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与这个犹太人遭遇的不断更新的叙述,使该形象保持着永久的生命力。“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传奇一直存活了将近2000年,部分地是因为这么多年来诸多‘见证人’的记录及讲述……绝大部分故事都来自第一手的证词或目击者所讲述的书面记录。所有这些都用来证明他们所讲述的这些经历是真实的,以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支持荒唐的说法。由于人们直到今天仍声称目睹过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所以这些故事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神话或传奇”。<sup>③</sup>

围绕“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还产生了许多谚语典故:在匈牙利,说某人好动不安时,常说他像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一样。在瑞典,他每年只被允许圣诞之夜在残留于田地里的犁耙上休息一次,而且这个鞋匠待过的犁耙将不能再使用,因为这将带来糟糕的收成,并且由它所垦过的土沟将不再生长任何种子。在丹麦,当耶路撒冷的鞋匠来到丹麦,世界将被毁灭。在芬兰,当耶路撒冷的鞋匠周游了整个世界,世界的末日就将到来。在法国这种警示更加直接,其出现预示着灾难的到来,他的经过通常与飓风、瘟疫、饥荒联系在一起。总之,该形象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为不同领域所运用。正如吉尔伦(J. Gielen)总结的,“亚哈随鲁是基督永恒的见证:他是激励民众进行忏悔的先知与牧师;他通常作为犹太民族的代表……他还被用来讽刺政治事务或提供了当代历史的标杆”。<sup>④</sup>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在流传和表述过程中虽经过无数次的改写和变化,但其最根本的内涵是全体犹太民族的人格化象征,证实着犹太人真实而永恒的命运——不停地流浪与四处的散居。归结起来,传说中的这个犹太人一般具备以下外在特征:(1)拄着拐杖。拐杖寓意着木制的十字架,由于这个犹太人在耶稣背负十字架时进行击打,所以他被注定永久与作为其象征物的拐杖为伴;(2)须发很长。长长的须发通常是正统犹太人的特征,而这也与中世纪基督教观念中的山羊、魔鬼有着共同的特征;(3)蒙着头巾。通常是著名的圆锥形“犹太帽”,自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公会开始就强制犹太人佩戴;(4)挂着钱包。钱包象征着叛徒犹大出卖耶稣所得的三十块银币,这个典故也被用来支持该形象;(5)光着脚身。鞋子对于流浪者来说是必需的,但这个犹太人却是光脚的,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卑微低下,同时也是将与周围人群区分开来的办法;(6)衣着独特。身穿破旧不堪的宽松长袍,表明犹太人的穷困潦倒,衣服肩

① G. K. Anderson, *The Legend of the Wandering Jew*,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42.

② 除《亚哈随鲁故事》提到的汉堡(1542年)、马德里(1575年)、但泽(1599年)外,甚至煞有其事地指出在布拉格(1602年)、卢卑克(1603年)、巴黎(1604年)、汉堡(1633年)、布鲁塞尔(1640年)、莱比锡(1642年)、弗兰肯斯坦(1676年)、慕尼黑(1721年)、纽卡斯尔(1790年)、伦敦(1818年)等地见过此人;还有人声称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1868年)见过此人。详见G. K. Anderson, *The Legend of the Wandering Jew*,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pp. 113-119.

③ Dana Edwards, *The Legend of the Wandering Jew*, Colorado Springs, Colo.: Piccadilly Books, 1998, p. 14.

④ Salo Baron,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vol. 11, p. 182.

上往往配有犹太徽章 这也是第四次拉特兰公会的强制要求; (7) 额有标记。在其前额上有个状若十字架的血红印记 以示这个新该隐必须牢记自己所犯的过错; (8) 举止奇异。每当人们念及耶稣之名他总要鞠躬长叹、捶胸顿足 以示自责与忏悔。实际上 他的这些悲惨外表 被基督徒视为上帝对犹太民族拒绝并迫害耶稣而招致惩罚的活生生之见证; 他以其永世流浪阐释并证明着犹太民族的不断被放逐 并以其生命不朽为耶稣福音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精神例证。总之 作为一种“永恒的他者诅咒” 这个邪恶、丑陋、卑贱的亚哈随鲁被建构为全体犹太民族的人格化形象。

### 三、世纪末的犹太“病”及其反运用

如前所述 亚哈随鲁的创造使“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发展为犹太民族的人格化形象 而在现代欧洲民族主义者看来它所反映出的最重要特征是犹太人的无根性 从而冲击着本地民族的认同建构; 正是这种无根性导致了犹太人精神的堕落与身体的退化 而且从长远看势必瓦解主体民族的同一性。在精神层面上 由于犹太人多数从事投机性的、不劳而获的活动( 例如放贷、典当、股票等) , “寄生虫”、“吸血鬼”便成为激进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的一种极其自然的表达; 在身体层面上 长期生活于隔都的经历使犹太人丧失了男性特征而成为病态的、女性化的他者, “女人气的”( *effeminacy*) 是反犹者们时常提及的犹太表征 “从中世纪开始犹太人在反犹宣传中的通常形象 就是特别的柔滑、渗透 善于变通与黏附 柔软得像女人一般”。<sup>①</sup> 而且 这种无根性还得到了有力的“科学”支撑 19 世纪下半叶新兴的精神分析医学即是典型代表。19 世纪 80 年代初在精神病分类学中出现一个新分支——“旅行中的精神失常”( *travelling insanity*) <sup>②</sup> 这种新的精神病症与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密切相关。自 1881 年起沙俄当局对犹太人进行“集体迫害” 到一战前致使 200 多万犹太难民如潮水般涌向欧洲西部 当时西欧的许多媒体不由惊呼“犹太人的大举入侵” 之前对犹太人的诸多担忧眼下成为事实。犹太人在西欧的遍地游荡成为“世纪末”( *fin - de - siècle*) 的一项独特景象 也使“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在当时成为真切而具体的存在; 因为遍地流浪只是犹太人身上才有的病态特征 简言之它即是一种犹太“病”。在精神病学者看来 东欧犹太人遍地流浪的这个事实与传奇故事中演绎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成了某种契合 从而使作为一个整体的犹太民族被建构为“病理学上的永世流浪者”( *pathological wanderers*) 。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作为一个典型病例是在 1887 年正式进入精神病文献之中 现代神经病学的奠基人、著名医生让 - 马丁·夏尔科( *Jean - Martin Charcot*) 对一个有着三年流浪经历的匈牙利犹太人科勒因进行精神病研究 并将之与传奇故事联系起来 “我向你们介绍的这个人 人们可能说他是亚哈随鲁或卡塔皮鲁斯的真正后代。事实是 就像我曾说过的那些强迫症旅行者那样 他不断为不可抗拒的需要所驱使去移动、去旅行 而无法在任何地方定居下来。这正是他历时三年穿越欧洲寻找至今仍未遇到的好运之原因所在。”<sup>③</sup> 然而 最关键的一步是由夏尔科的学生亨利·梅格( *J. Gielen*) 所迈出。在对自愿前来诊所的大量犹太病人进行诊断的基础上 1893 年梅格发表了《临床中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一项神经病理学研究》 他将犹太神经系统的临床研究与大众流行的传奇故事结合起来 认为匈牙利犹太人科勒因并非孤立的事例 犹太人的流浪是种族意义上的流行病; 正是由于其种族特征才导致他们对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宿感 因而所谓的犹太精神病往往通过不可抗拒的流浪冲动体现出来 而且这种病态的、不足的旅行受到世界犹太人组织的鼓励和维持。在梅格看来,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即是这种真实的医

<sup>①</sup> M. C. Nussbaum, *Hiding from Huma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8.

<sup>②</sup> Jan Goldstein, “The Wandering Jew and the Problem of Psychiatric Anti - Semitism in Fin - de - Siècle Fr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0, no. 4 1985, p. 537.

<sup>③</sup> Henry Meige, “The Wandering Jew in the Clinic: A Study in Neurotic Pathology”, in G. Hasan - Rokem and Alan Dundes ( eds. ), *The Wandering Jew*,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91.

学现象——犹太人通常为“旅行精神病”(travelling neurosis)所折磨——的先见性解释:犹太人不知疲倦、无始无终地流浪并非某种超自然惩罚的结果,而是他们强烈倾向于精神病的本性所致,“让我们不要忘了他们是犹太人,正是他们的种族特性使之极其轻松地来回迁移。没有地方是家,任何地方都是家,为了重要的事务以色列人毫不犹豫地离开他们的家;尤其因为他们是病态的,而去寻找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sup>①</sup>

在当时欧洲民族-国家建构的时代大背景下,犹太“病”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认为犹太人的种族退化将使整个欧洲文明受到污染而走向衰亡,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医治乃至隔离;精神医学遂以理性之名行疯癫之实,犹太人从而成为被规训、被惩罚的他者。梅格等人对犹太人永世流浪所作的精神病理学诊断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反犹偏见的左右,因此可被称为“科学化的反犹偏见”;它抛弃了该形象原有的宗教反犹内涵,但却是隐形而更为残忍的种族反犹论调。实际上,世纪末对犹太“病”的界定,是对犹太人在任何地区都找不到归属感的古老偏见的新表达。吊诡的是,反犹太者的这种贬低性界定甚至为以民族主义途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锡安主义者所接受,他们频繁用“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来形容身体退化、脱离土地的流散犹太人;认为长期的流散使犹太人不仅在身体与生理上萎缩而且也在精神与心理上扭曲,而成为一个幽灵一般到处流浪的病态民族。

然而,锡安主义者从未像基督徒一样将该形象视为文化真实,而只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对永世流浪这种犹太“病”的接受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犹太人种族退化的自我关怀与深切忧虑,以将之用来作为颠覆传统犹太形象的重要手段。差不多与梅格从精神病理学探讨“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同时,犹太医生、锡安主义领袖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 1849-1923)于1893年出版的《退化》(*Entartung/Degeneration*)一书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之作。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相反,它警惕人们在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注意身体形态的萎缩与精神状态的堕落。从长远看,这部著作的主要作用在于唤醒犹太民族避免走向退化。在当时的反犹观念中,犹太人被视为女人气的、日渐退化的代表;因此,当务之急即是强健犹太人的体格、重建“犹太男性气概”(Jewish masculinity),为民族复兴奠定个体基础。1898年诺尔道率先倡导应对犹太形象进行革命,呼吁创造新一代“有肌肉的犹太人”(Muskeljuden/Muscle Jews),以此实现从“退化”向“复兴”的蜕变,“锡安主义通过对青年一代的身体教育复兴着犹太身体,而这也将复兴失落已久的有肌肉的犹太精神”。<sup>②</sup>

在此情况下,锡安主义者对该形象进行了“犹太化”(Jewify)的处理,“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所代表的不仅是种族退化的警示,而且寄寓着民族复兴的希望:意在实现从永世流浪的“旧犹太人”向扎根故土的“新犹太人”的转变。他们指出所谓犹太“病”的根源在于流散生活本身,正是永久的流浪与自愿的依附导致犹太人完全失常而为病态特征所取代。因此,犹太人得救的关键在于再度实现“正常化”,反映到亚哈随鲁身上即是解除诅咒的他结束永世流浪、回归故土。“亚哈随鲁回归”具有双重的神学意义:一方面,他的回归体现着以聚集流散者为目标锡安主义的世俗弥赛亚运动的特征在犹太神学中获得了特殊意义;另一方面,他的回归对基督教也有独特作用,因为锡安主义被不少基督徒理解为耶稣基督复临的先兆。<sup>③</sup>由此,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正在回归家园”(coming home)的主题不断被锡安主义者所强调。

犹太人对此形象的接受在艺术作品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艺术家借助大胆想象对之倾注以民族主义的满腔热情,“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被塑造成带领民众回归故土的先驱,通过他犹太民族与犹

<sup>①</sup> Henry Meige, "The Wandering Jew in the Clinic: A Study in Neurotic Pathology," in G. Hasan-Rokem and Alan Dundes (eds.), *The Wandering Jew*,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92.

<sup>②</sup> George L. Mosse, "Max Nordau, Liberalism and the New Jew,"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7, no. 4 Oct., 1992, pp. 570-571.

<sup>③</sup> Israel Idalovich, "Creating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a Legend - The Case of the Wandering Jew,"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s and Ideologies*, vol. 4, no. 12 Winter, 2005, pp. 3-26, esp. 13.

太文化得以拯救。著名犹太雕塑家阿尔弗雷德·诺西格(Alfred Nossig)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与通常描绘取得胜利的古代犹太人与渴望回归的流散犹太人的锡安主义艺术不同,他创作了一尊极不寻常的雕塑——《永世流浪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首次发表在著名的锡安主义杂志《东方与西方》(Ost und West) 1901年第一期,随后又展览于第五届锡安主义代表大会。诺西格的十分特别之处在于,他大胆选择反犹形象亚哈随鲁作为创作的意象,但同时借助米开朗基罗的名作《摩西》(通常被认为是体现犹太民族自决意识的经典之作)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个锡安主义英雄:这个犹太人以强壮的肌肉与宽大的手掌将托拉牢牢地握在胸前,表示他将像接受托拉的摩西一样带领民众重返应许之地;<sup>①</sup>在此,被诅咒流浪到末日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变成犹太文化的保护者,所以也是犹太血脉的拯救者。诗人本·以色列(Ben Israel)则在该杂志同期发表了同名短诗,诗中该形象再度成为锡安主义的英雄隐喻,作者有意忽略他所受到耶稣的惩罚,而是赞扬他从圣殿毁灭中拯救了托拉,正如最后一节所写的:“和散那! 救赎之日已经来临/他将很快回归应许之地/这个永不休息的为首者/正倚靠在圣殿的断垣上/神圣的沙石沾满了泪水/托拉,托拉已经得救!”<sup>②</sup>

进入20世纪后,有关该形象的文学创作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大降低,其影响逐渐为另一反犹传说——指控犹太人阴谋控制世界的“锡安长老议事录”(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所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反犹者对其形象的完全遗忘,纳粹政权上台后重新利用它进行反犹宣传,以为即将到来的种族灭绝制造舆论声势。在希特勒的直接授意下,1940年11月29日以此为题材的反犹电影——《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正式公映,在其最高潮处以希特勒的讲话作结尾:“如果欧洲内部与外部的国际性金融犹太人再次成功地将各民族推向世界大战,那么其结果将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sup>③</sup>

#### 四、结论 “他者”的表征及其自我化

在无比惨痛的历史教训下,二战之后的基督教会对其反犹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开启了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对话与和解;特别是梵蒂冈教廷于1962—1965年间召开了由教皇和两千多名主教参加的第二次大公会议(Concilium oecumenicum Vaticanum Secundum,简称“梵二会议”),清除了自身教义中的反犹说教,解除了针对犹太人谋杀基督的指控。随着两教关系的改善,此前对犹太人的诸多不实形象逐渐得以澄清,从而动摇了“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的神学根基;更重要的是,犹太民族在具体形态上结束了“流散”状态,使该形象丧失了现实基础:在二战结束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国在故土奇迹般地诞生,宣称其宗旨即“聚集犹太流散者”。至此,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已经回归家园”,从而为该形象划上一个迟来的句号。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sup>④</sup>——这是后殖民主义对于弱者的标准定义。而在“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形象的建构史中可以发现,弱者并非一直是沉默不语、无所作为的他者:作为一个基督教社会创造的反犹形象,它在形成及传播初期为传统基督教的神学反犹动机所充分利用,成为其贬损、异化与隔离犹太人的有力手段。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结合着种族卫生及精神病理等这些“现代”反犹排犹策略,欧洲主体民族对犹太人的固有憎恨被再度投射到该形象之上,将之表征为种族病态、低劣的体现。而另一方面,作为他者表征对象的犹太人也对之加以利用,进行了“自我化”的吸收和改造,将此根深蒂固的反犹形象内在化为复国主义的精神先驱并以此来

①② Todd S. Presner, *Muscular Judaism: The Jewish Body and the Politics of Regene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79-81, 81.

③ John J. Hartman, “A Psychoanalytic View of Racial Myth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analytic Studies*, vol. 2, no. 4 2000, p. 335.

④ 转引自(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扉页。



为犹太人回归故土正名。正如哈桑-罗克姆(G. Hasan-Rokem)所总结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在犹太文化中是一个多元的标志。在其使用的每一事例中,它都被视为一系列没有解决的对立——中心与边缘之间、历史与救赎之间、民族性与普世性之间的标志”。<sup>①</sup>由此可见,他者与自我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他者的表征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被自我化,从而模糊了它最初被赋予的内涵。实际上,对他者形象的社会建构并非来自主体的单方面行为,它的霸权时常会遭到挑战与拒斥;作为他者的被建构者通常也会将之进行有利于己的改造与阐释,从而以这种独特的反抗形式参与到形象建构中来。

**Abstract** Borne from the same legend, the image of “the Wandering Jews” wasn't originated from time immemorial. Formed in the 13th century, it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camp of Christianity in the beginning. But this image had suddenly gained fast dissemination and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since the Reformation. And it had become a stereotype image of Jews personifying the Jewish people in Europe and served as a metaphor for their eternal living condition in Diaspora. With the penetra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Race-Hygiene and Psychopathology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it was also deemed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hysical disease rooted in the Jew's soul. Such views snowball an error and produced tremendous influence. Even some Zionists internalized and elaborated it in a nationalistic way. An analysis of the creation, regulation, transmission and popularity of the image can distinctly highlight the power operation, the discourse control, and the cultural gaming that is lurked under the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艾仁贵,博士研究生,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450001)

(责任编辑:黄凌翹)

## 更正说明

本刊2013年第2期所刊《非汉闾大家族形态与制度:东西方向有的亲族理念》一文,因排版、编辑而产生歧义之处,现更正如下:

1. 第31页“内容提要”末“家族世系群”,应该恢复为“家族村落、世系群”或“大家族、世系群”。2. 第37页正文倒数第9行“父亲爵位”与“18世纪……”之间有句号。3. 第39页第3自然段第二行“卡尔达林人以家族公社喻大火炉”,应该恢复为“卡尔达林人家族公社意大火炉”;后一句应该恢复为“高加索人以火炉灶喻父系大家族”。4. 第40页正文倒数第8行:该书“以此作为”母系大家族(氏族)产生父系大家族的补证论释,应该恢复为“该书对此做母系大家族(氏族)产生父系大家族的补证论释”。5. 第41页第12行“民主——(即)父权型”,应该恢复为“民主—父权型”或“民主与父权型”。6. 第45页第二自然段第5行“大家族观念在历史中普遍存在”,应该恢复为“大家族观念在西方历史中存在”。

特此向作者与读者致歉!

《世界民族》编辑部

2013年6月

<sup>①</sup> G. Hasan-Rokem, “The Wandering Jew: A Jewish Perspective”, in Moshe Goshen-Gottstein( ed. ),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World Congress of Jewish Studies*, vol. II, Jerusalem: Magnes Press, 1988, p. 195.